

貝恩斯坦選編

曾紀元譯

杜威論經驗、自然與自由

臺灣商務印書館發行

貝因斯坦選編

曾紀元 譯

杜威論經驗、自然與自由

臺灣商務印書館發行

中華民國七十年八月初版

杜威論經驗、自然與自由 一冊

基本定價二元六角正

原編者 Richard J. Bernstein

譯述者 曾紀元

發行人 朱建民

印刷及發行所 臺灣商務印書館股份有限公司

登記證：局版臺業字第〇八三六號

版權所有
翻印必究

校對人：張樹怡 洪美淑

序 言

這本杜威選集的主要目的是在揭開他的經驗與自然的廣博學說的要旨。在導論中，我同意：大約以一九二五年經驗與自然的發表開始，杜威自覺地轉向對他的哲學的主要論題作更加切實的澄清與辯明。除了選集的二篇以外，全數都是在一九二五年以後出現。二篇較早的論文（「哲學復原的必要」以及「形而上學的探究的問題」）有助於使杜威的哲學事業的成熟時期變為更清晰的中心點。

因此，這些精選的論著予杜威哲學以一般的介紹，而且顯示他的研究的變化多端。評價以及評估杜威的若干極重要的論文，現在只能在分散的絕版書與雜誌中發現的都在這裏再版。這些精選的論著已經予以整理，以便引導讀者從杜威思想之更精湛而具體的特徵走向更廣博的特徵，闡明經驗、自然、與自由的題目。每一篇論著的導引評論解釋本文，而且暗示與其他精選論著的若干最重要的關係。

導論，以及選集的最後選擇從亨德爾（Charles W. Hendel）教授以及斯密（John E. Smith）教授的敏銳的同感的批評獲益匪淺。他們首先教我體會到：杜威嘗試說新穎而重要的事情。我亦感激派斯得（Oskar Piest）先生，他不但給我寶貴的編輯意見，而且主動地參與塑造這本書的特性。波爾翠（Suzanne Boorsch）小姐親切地幫助看校樣以及編纂索引。最後是我的妻子加羅爾（Carol），她最先提議編纂這本選集，而且愉快地幫助它的出版。

貝恩斯坦

謝 意

因爲這本書中的論文再版的許可，我要深致謝忱的是：

麥米倫公司，因爲它的「從絕對論至實驗主義」，見當代美國哲學，第二版，一九三〇年。

亨利好爾及公司，因爲「哲學復元的必要」，見創造的智慧：實驗的態度論文集，一九一七年；以及「探究的方式」，見理則學：探究的理論，一九三八年。

哥倫比亞大學出版社，因爲「諸經驗主義的經驗觀察」，見觀念歷史的研究，一九三五年第三版。

加利福尼亞大學出版社，因爲「情況與思想」，見加利福尼亞大學哲學刊，第一二期，一九三一年。

紐約大學出版社，因爲「時間與個性」，見時間與它的神密性，第二版，一九四〇年。

哲學評論雜誌，因爲「經驗的性質」，見四九期。

杜威夫人以及哲學雜誌，因爲「形而上學的探究的問題」，見該雜誌一二期，一九一五年；以及皮爾斯的「性質的學說」，三二期，一九三五年。

杜威夫人、阿伯特夫人、以及哲學雜誌，因爲「復阿伯特先生的一封信」，四六期，一九四九年。

帕特南（G. P. Putnam）先生的公子們，因爲「有一個經驗」，見經驗的藝術，一九三四年。

杜威夫人以及帕特南先生的公子們，因爲「性質上的思想」以及「自由的諸哲學」，見哲學與文化，一九三一年，一九五八年。

導 論

一、杜威的傳奇

自一九五二年，杜威死亡不足十年，而且自一八五九年，他的誕生一百年。他的生動的哲學生涯伸展六十五年之久，而且他的事業的發展與轉變的故事不僅是一個人的歷史，而且是整個時代的智慧的努力的歷史。並且當一個人問什麼的確是美國最有勢力的哲學家之貢獻，有什麼事情在他的哲學中是特殊的而且是持久的價值時，使人不由想起許多陳腔濫調，這些陳腔濫調使清澈的悟性暗澹。杜威的傳奇的出現甚至更易引起誤解。

近來杜威的哲學，或者更正確地說，他的哲學的諷刺描述（caricature），已經受到來自許多方面的攻擊。他的教育哲學的影響被引為美國教育緩慢與浪費的一個主要原因。一般認為他相信教育的功能是滿足兒童的需要而且使他適應他的環境。杜威被控訴散播有害地影響種種美國社會生活的適應倫理學。他的實用主義或工具主義被描述成為膚淺的而且反智慧的學說，因此只在作為實用的目的之手段時才是有意義的，確實的，或者有價值的。挾近代修正統神學的聲望，另一個控訴是：在杜威看來，人是一個技術的動物，他一貫地在作而且在為，為一個似乎永遠不會來臨的將來作準備。杜威，這些批評家聲稱，忽視人類生活更深奧的個人的經驗。對杜威的這些種種的攻擊已經引起這樣的傳奇：杜威是昏庸的思想家，他的

社會的以及教育的觀點已經把美國導入歧途，而且他的哲學，當分析到最後時，在本質上是反智慧的。

所有這些都是對杜威實際地信仰的事情顯然的歪曲，而且是危險的歪曲。所以是危險的，因為經常地，對杜威的攻擊掩飾對民主社會的智慧和角色的攻擊。杜威的根本信念（甚至可以稱為他的第一原則）是：適當地利用智慧，人們能夠處理當代世界的複雜的迫切的問題。人們至少能過（假使不是第一流的哲學家的美好的生活）更好的、更有價值的、而且更加人道的生活。杜威不是感情主義者。他之對智慧的信心不是以關於人性的天真的樂觀主義為基礎。與許多哲學家相信者相反，杜威以為：人不是生來智慧的，或者理性的。智慧不是可以隨意運用的理性的能力，它包括一組習性與傾向，像脆弱的植物一般，必須小心地而且刻意地培養，不然的話，它會枯萎。所有生活領域的所有人的智慧的鼓勵與使用是創造的民主的永恒的工作。

沒有一條使智慧的理想變為有效的的捷徑。它要求一貫的注意與忍耐。最近有一種增長的對這一智慧理想的幻滅與不耐。而且杜威的傳奇已成爲嘲弄這個理想與訕笑智慧的效果的工具。對理性力量的失望變爲時髦之前，杜威警告：對當代智慧的否認之適當反應應該不是失望或逃避主義，而是使這個理想變爲具體的實在的更大的堅忍與努力。

多彩多姿的杜威的傳奇的最佳的批評家無疑地是杜威自己，而且這本文選的傑作表露這一點。譬如，研究杜威的教育哲學的問題。杜威從來不主張教育應該單純地滿足兒童的需要與奇想怪念。在一篇他最早的論教育的專文中，即兒童與課程（一九〇二年），他批評教育的兒童定向理論，深刻地指出它庇護形式而空虛的發展觀念。兒童被期望無接受適當的指導而「爲自己精細地計劃事情。」①主張兒童的完全自由

反映「兒童的天真的幻想與行爲之感情的理想化」②而且不可避免地導致「放任與寵壞。」③杜威的批評者與辯護者都經常地忽視他之對教育的放任方法的批評。這種批評在杜威的全部著作中都顯示及解釋。他告訴我們：「照一個人的意思的作爲表示真正的智慧的進取精神與獨立精神的解除，」④而且當無限的自由表達被允許時，兒童逐漸變得無精打彩，而且終於厭煩起來，而且沒有能力上日益增長的發展以及結果的實際的成就。」⑤反對這種觀念，杜威主張審慎的指導、監督，以及命令的必要。教育是，或者應該是，一個不斷地重建的歷程，在這個歷程，有離開兒童的不成熟的經驗而指向更加充滿意義的，更加系統而有秩序的經驗的前進的運動。這個運動只有藉教師的智慧的指導才能夠實現。

杜威的教育哲學的要點使人想起另一個教師——蘇格拉底——的實例。從柏拉圖的早期的對話錄，即蘇格拉底通常與雅典青年的談話，我們最清楚地看到這一點。理解到他的對話者的差異，而且注意到他們的潛力以及缺陷，蘇格拉底技巧地激發他們的本能的興趣，而且逐漸地引導他們走向精微的哲學分析。在 *Lysis* 中，談話從戰車、家庭生活以及朋友的討論，進至較抽象而複雜的題目：友誼的性質的研究。蘇格拉底總是控制對話，而且使用見慣的以及有趣的事情於 *Lysis* 及 *Menexenus* 以便發展他們的智慧能力，而且引導他們走至更系統的而且審慎的思維。在杜威的教育哲學中，不能忽視而通常被忽視的是：他之強調明確的目標，以及對培養判斷思維所需的藝術（所有藝術中最困難的一種）的巧妙指導。雖然有一個流傳很廣的信仰，就是，美國的教育已因杜威的影響而蒙受損害，但更加正確的是：僅就這一信仰無法發展智慧的意志堅強的習性而論，它未能接受對杜威來說是最基本的事情的影響。

已經成爲這個傳奇的一個部分的另一個獨斷之見：杜威的至善（*summum bonum*）是對現存社會環境

的適應。解釋杜威爲主張自身對有勢力的社會環境的適應是不瞭解他所說的以及所做的每一件事情的要領。這個獨斷之見將被發現到幾乎在現在的他的選集的每一頁中被否認。杜威總是強調重建或重新調整環境，目的在使它並且因之使一個人自己的經驗變爲更理想更有價值的事情。這是一個歷史的諷刺：一個道德的調整應因於杜威，因爲他的作品，恒久地明顯的事情之一是：近代工藝學的社會正在產生一個更馴良的，消極的個人。這是，他聲稱，民主社會的最大威脅，因爲它助長無個性，而且助長更大的平庸。在社會定向的著作近來一時高張很久前，杜威警告說：現在的社會制度的自然傾向是把人塑造成失去他的自由與個性之消極地適應的動物。

杜威與經驗之社會的以及一般的看法的關係已經成爲許多攻擊的標的。它被認爲是對經驗的個人的以及私有的觀點無真正興趣的證明。但杜威的社會現象的分析是無法了解的，除非我們察知他的創造的個人的社會的素志，這樣說，並非誇大其辭。自由、個性、以及創造性是人的天資，當外在的束縛解除，它們便獲得釋放，這種信仰是以人性的能力觀念爲基礎。在這裡亦存在杜威對古典自由主義的批評的重要理由，古典的自由主義，雖然提供一個重要的歷史功能，對當代世界不再是足夠的，正因爲它低估了特殊的社會環境的巨大的發展的影響。如杜威在「自由的哲學」中告訴我們，祇是阻礙的排除對獲得權利以及得到自由是不夠的。人的自由不是一個事實，它是一個可能性，但像其他所有的可能性一樣，這個可能性有待實現，而且像所有其他的可能性，只有經由與客觀環境的交互作用才能夠實現。假使人期望得到真正的自由與個性，反擊工藝學的社會之自然的傾向是必然的事。現在的社會制度必須重建，以便它們鼓勵創造的個性之實現。怎樣才能夠達到這個目的，不能夠概括地回答，因爲這是特殊的環境之特殊的改革的事情。

因此，我們瞭解：使我們適應現存的社會環境，這種適應引致單純地接受為這環境的因素的現時價值，與杜威的建議（proposal）正相反。反之，我們必須繼續地努力改革而且重建社會的制度，以便我們的理想的價值具體地實現。這種社會改革的見解與教育的關係應該是明白的。我們經常地談論到一代的失敗以及年輕一代做較佳的工作的希望。這是一個無用而富於幻想的希望，除非我們採取具體的步驟來改革教育的方法，以便對過創造性的智慧生活是必要的那些傾向得到鼓勵。當杜威說學校是一個社會時，他的意思不是說：學校應該反映社會的占優勢的價值，而是說學校社會應該接近一個更理想的社會。假使從早年，兒童便接受一種教育，這種教育予他以學校生活的「有效的自我指導」^⑥的方法，我們便有有效地改革其他社會制度的最佳保證。

被誘惑而思考一個哲學家強調社會的角色時他可能低估個人的需要與權利，便揭露了個人與社會之間，一個人的思想的缺口（separation）。杜威否認這種缺口，他說：個人與社會（individual-and-society）是統一的有機的交互作用，在這個交互作用之中，一方面的性質與作用依賴於另一方。因此杜威之關心社會制度是建立於這個原理：創造性的個人不會自發地出現，惟有當他們的活動的媒介，即社會，助長他們的發展時才可以。

環繞着杜威的教育與社會重建理論的混亂（這種混亂已變為這一傳奇的一部分）為對於他的工具主義或實用主義的其他誤解所加深。我稍後將討論杜威的工具主義的內容與含義，當我們研究他的哲學的發展時，但這時我們能夠排除阻礙眼光銳利地接近他的立論（position）的主要障礙。加上「實用主義的」以及「現實的」的片語，對杜威或者是誤解，因為這些片語已經引起如此之多的混亂。當「實用主義的」

變為流行以前，他喜歡形容他的立論為工具主義，而當後一名詞引起如是之多的誤解時，他放棄它了。因為「實用主義」現在是我們的普通語言中的一個字，它代表的理論是：要是某些事物是有意義的或者真實的，只有當它作用或有某些巨大的實際的結果時。杜威明白地否認即使只是類似實用主義的這種流行觀念的任何立論。像他自己曾說：

開始一個傳奇比阻止它之繼續流布較為容易。對工具主義的邏輯的誤解，沒有什麼再比使知識僅成為某一實用的目的之工具，或實際需要之滿足工具——「實用的」被視為表示某一物質或麪包牛油一類的某些極固定的效用——的信念更加持久不衰了。「實用主義的」這個字所引起的通常的聯想比任何實用主義者能夠作的最明白而有力的聲明都要強烈。^⑦

並且我們必須問，用「實用主義的」這個字，杜威自己究竟意指什麼？在同一論文中，他聲稱，「實用主義的」習慣上用來喚起對「參考一切思想的最後意義及試驗的結果之必要」的注意。這些結果，從這一術語的常識的意義，不是必然地「實用的」；它們在性質上可以是「審美的，或者道德的，或者政治的，或者宗教的。」^⑧

杜威的工具主義亦與邏輯的實證主義者之經驗主義的意義之能證實的標準相比較。他的工具主義實際上是一個遠較豐富而且遠較自由的立論。這些實證主義者，至少在他們的初期，予結果的特殊的類型以認識論的優先權，這種結果的特殊的類型是可以直接地觀察的。從杜威的觀點，絕對的可證實的理論以經驗的柔弱的而且有缺點的觀念為先決條件，它是無判斷地從英國經驗論者的傳統接收過來的。杜威主張（如在以下整個選集所見到的，尤其是「性質的思想」中）經驗可以為無數的質的蔭影所彌漫，而且包含遠較實

證論者的哲學中所認識者爲多。近代哲學與認識論的過分關係要對分配感官感覺一個特權地位而忽視環境而且包含感官感覺的經驗的五花八門的性質的變化負責。工具主義不能與剝奪經驗的實在的富有而且把它與沒精打彩的抽象概念混爲一談的經驗論分別。工具主義，由於喚起對經驗的性質的變化多端的注意以及對將來的經驗的結果（藉以瞭解觀念或學說）之角色的強調，對經驗的傳統介紹一個新的而且性質改變的度空間（dimension）。

當我們瞭解杜威的經驗分析之更大的適當性時，尤其如他更後的哲學中所討論的，我們亦發現那些聲稱杜威認爲人是技術的動物，老是爲一個永遠達不到的目的在作在爲的不安靜的動物的人的誤解。杜威強調：認識不僅是我們的頭腦中進行的事情，而且涉及對環境的靈活的操縱。就這一點，他發展康德的洞察，他瞭解：革命發生於科學，當它變爲真正地經驗的，而不是無目的的觀察的蒐集時。當以理性的方法來研究自然，而且積極地限於對特殊的問題予以答案時，人獲得科學的知識。同樣地，分析道德的情形，杜威強調行爲（action）的角色。在道德的情形，果斷的行爲是需要的，不能夠避免，是作最聰明的決定而且是追求最佳的活動方法的問題。因此杜威強調科學及道德二者的探究活動。但他審慎地觀察以及分析在經驗範圍之內的成就（consummation）與實踐（fulfillments）。杜威極敏感於這個批評：努力獲致他的工具主義，他強調衝突的要素（moments），而且在更成熟的著作中，他對經驗的成就的領域予以更密切的注意。

有組織上配合得宜的，而且審美上合於邏輯的經驗。用杜威的用語來說，這樣有生氣的經驗「充滿了」意義與價值。這些實踐是人類生活最有價值的事物的泉源。經驗，杜威強調，應該變爲最有生氣的，審美的，而且充滿意義的。當然，只要人是活的，便一定有需要行動與解決的新的衝突與問題，但是，正確而

根本的是：人類的生活由成就組成，因為成就，衝突乃被調和與克服，因為成就我們的努力得滿足。藉智慧的使用，我們能夠產生而且保證使生活值得生活的不確定的價值。因此知識在二個基本的方面是有功用的：在獲得對麻煩的情況作智慧而實際的控制上，它是有幫助的，並且「使繼起的經驗之直接意義更加殷實上，它亦是與有力的。」^⑨

我們已經討論組成杜威的傳奇的普遍的混亂。可是，有一個更根本的需要矯正的歪曲，而且這本論著集的主要目的是矯正這一點。當杜威的名字被述及時，通常與他的教育的以及社會的哲學或者與他的知識的功用的學說有關，這是引起信徒與批評者二者最大注意的他的哲學的觀點，但要瞭解他的著述的這一方面，瞭解他的經驗的與自然的廣博的學說——杜威哲學的中心——是不可缺少的。

杜威反叛傳統的哲學以及形而上學（像在他以前的許多哲學家一樣），但反叛不是等於一種完全的拒絕。他不以為哲學的傳統是無價值的，他亦不放棄它的廣博而普遍的哲學理想。除非哲學看來顯得是超越「特殊」(the specific)與「零碎」(the piecemeal)而且嘗試提出了解人類以及宇宙的廣博的觀點，它是不完全的。哲學的一個長久工作是擴展人們的洞察與想像能力。杜威，像皮爾斯與詹姆斯一般，嘗試在經驗與自然的廣博的學說之內，聯結討論特殊問題的新的方法。

特別在他的更後的哲學中，杜威變得逐漸地關心於系統地說明他稱之為自然主義的形而上學的事情。這樣的形而上學不主張發現這樣的實在：超越一切經驗，只有以先驗式才可以認識。它是後天的形而上學，是敘述的、臆說的。它的目的是敘述而且顯示存在 (existence) 的一般特性之相關。它與存在 (existence) 的科學報告不同，這是因為它的普遍性，而不是因為它的題材或它的研究方法的最優性。在一九一五年（

見「形而上學的探究的問題」），杜威概述這裡推荐的若干選文所完成的自然主義的形而上學的計劃。

雖然杜威明白地轉向經驗與自然之存在的一般特性的研究，他之對敘述的形而上學的興趣出自他之對特殊的問題與感覺的困難之關懷。處理這些問題時，他被迫研究經驗與自然的根本範疇，逐漸地，由於這些特殊的討論，一個一貫的廣博的觀點浮現，這個觀點予杜威哲學研究的整體以新的說明。假使我們希望了解一般特性的成熟學說，我們必須研究它得以向前發展的情況（*contexts*）。我們必須回溯杜威自己的哲學發展，以獲得對它的根源、構造、意義的清楚的洞察。

二、杜威哲學的發展

我們能夠發現杜威哲學的發展的三個連續的時期，每個時期大約持續二十年。第一個時期可以稱之為他的形成的（*formative*）時期，而且從一八八二年，他的最早的著作出版，持續至一九〇三年邏輯理論之研究問世。關於杜威的討論，這個時期通常被忽略，雖則他寫或者與他人合著了大約半打書，而且是一位多產的作家。許多他的更遲的觀念發現在這時期萌芽。我們將嘗試驅除對於這個早期的若干忽略，以便領會它如何幫助我們瞭解他的更後的作品。

第二個時期，這個時期被最普遍地討論，大約從一九〇三年，持續至一九二五年。邏輯理論之研究成為杜威較早的探索的頂點以及他的工具主義的邏輯的明白介紹的特徵。它出版後不久，杜威從芝加哥大學轉到哥倫比亞大學，在那裡他遇到一個清新的而且挑戰的智識環境，這個環境更進一步地促成發展的新階段。在以次的二十年，他發展他的知識與評價的工具主義說以及他的教育的與社會的哲學。這個時期亦是

他在美國的思想中發生巨大影響的時期。

第三個時期大約始自一九二五年經驗與自然的出版。第三時期的特徵極少被認識與重視。有一個流布的意見：在他的更遲的歲月，杜威僅細密地說明他自始至終已經說過的事情。但是這個時期是杜威最使人感到興趣而且重要的時期。他回到較早的觀念，重新研究它們，而且批判地分析他的論點的假定。他的哲學的各種觀點中的相互關係變得更加明白，而且有一貫而廣博的見解之出現。在這個時期，杜威最重要的書出版，包括經驗與自然（*Experience and Nature*）（一九一五年），確信的探求（*The Quest for Certainty*）（一九一九年），經驗的藝術（*Art as Experience*）（一九四三年），以及理則學：探究的理論（*Logic : The Theory of Inquiry*）（一九三八年），另外還有許多在這裡不包括的重要的論文。

分杜威的發展為三個時期，我們不是說它們是明顯地分開的，或他意識地邁進新的時期。可是有著重的根本的轉變，這些轉變使人辨別到不同的雖則連續的時期。杜威的進展可以用他自己最喜歡的，含有「發展階段」的有機的範疇來說明。一個較後時期的初期的形態發現於前一個時期，而且較後的時期解釋較前的時期的優點與缺點。現在讓我們敘述每一個時期的特點。

（一）形成的時期

一八八四年，杜威，剛剛發現黑格爾的二十五歲的豪放的年輕哲學家，這樣寫道：

經驗是逼真的，不是抽象的。精神的生活是這種經驗的最充分的表現。新的心理學以從這種經驗獲得它的邏輯為滿足，而不強使它（經驗）合於某些先入的抽象的觀念，以損害後者（經驗）的神聖與完

整。它需要事實的、方法的、生活的邏輯。^⑩

這篇文章，以對先驗的範疇的懷疑，以及對具體的事實的強調，響應杜威從他的老師以及後來密西根大學同事，毛禮斯（G.S. Morris）學習得來的黑格爾主義。這段文章亦顯示杜威哲學努力之最顯著的課題：從經驗發展一個邏輯，而不是強使經驗變為人為的範疇。而且亦預示杜威之最後的拒絕黑格爾，他總之不損害經驗的「神聖與完整」。

年輕的杜威對黑格爾是成熟的，在他的自傳的概要中（「從絕對主義至實驗主義」），他記述他之醉心於黑格爾的有機的統一（organic unity），是一篇精密的報告。

它滿足統一的要求，這統一的要求無疑地是強烈的感情的渴望，但是僅理性化的題材才可以滿足的渴望……可是黑格爾的主觀與客觀，物質與精神，神與人的綜合，不僅是智慧的公式；它運作為無限的釋放，一個解放。黑格爾的人類文化、制度以及藝術的論述，影響嚴格的劃分線的同樣的解除，而且對我有真正的吸引力。

引起杜威注意黑格爾的不是辯證論的專門性，甚至亦不是這個特殊的學說：晉升為宇宙的哲學範疇的是有機體（the organic）。在他的發現黑格爾後的最初十年，幾乎在杜威所寫的每件事情中，無論在心理學、倫理學、或社會哲學的領域，他都主張：藉有機觀點的解釋，錯誤的哲學二元論會被消滅，而且進步將確然隨之而來。他的工作主要地是計劃性的，因為他未能提出他所謂有機的的事物的清楚的分析，雖然瞭解他所意指的事情的意義是可能的。

有機的範疇（the category of the organic）將使折磨哲學的極端二元論一無所為，包括身——

心，思想——現實，以及主觀——客觀。有機的統一是一個整體，有無分割的差別，因為在它之內的區別在性質上是功能的。範疇亦集中注意於瞭解一個觀念或一個制度的發生以及發展的必然性，以認識它的性質。而且最後地，惟有有機（the organic），以它的特殊性與具體性，足夠地使經驗再現。

杜威對哲學的二元論的傾向的天真的懷疑為黑格爾所加強，他嚴厲地批評所有各種哲學的二元論。二元論的懷疑處於杜威一生的哲學的最顯著的地位。他相信，近代哲學二元論的傾向（strain）起於區別（distinctions）藉以得建立的情況的忽視，而且起於未能察知經驗的有機的特性。情況的忽視，連同隨後的實在（reality）的歪曲，是哲學思想的最普遍的謬誤。因之杜威反對已經鼓舞柏格森、詹姆斯、以及懷特海，而且懷特海的表現法描繪為「代替的具體性之謬誤」（the fallacy of misplaced concreteness）的相同的哲學傾向。

在這些早的日子，杜威的興趣不限於探究新黑格爾主義。從他的事業的開始，他表現對科學以及它的方法論的強烈的興趣，特別是生物的以及如旭日方昇的社會的科學。十九世紀的後期充滿了達爾文的進化論的含示（implication）。（物種原始在一八五九年，杜威出生之年，出版。）不像達爾文主義者（他們嘗試直接地計劃整個宇宙的進化論的生物學的範疇），杜威更敏銳地受達爾文的影響。進化論的意義，依杜威之見，是在它顯示：科學的方法可以伸展至生物的而且社會的動物——人的研究。它為能清除內省主義者的術語而且能夠從生物學的觀點創造新的進步的新心理學鋪路。詹姆斯的心理學原理的生物學的主張比詹姆斯的實用主義的著作影響杜威尤大。由於達爾文的貢獻，杜威亦了解到，許多黑格爾的見識（insights）可以免於含糊的黑格爾哲學的術語之累，而用與科學見解更相調和的語言來表達。